



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 及其当代价值

Marxist Theory of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李艳艳 著

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 及其当代价值

Marxist Theory of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李艳艳 著

责任编辑:杨文霞

封面设计:毛 淳 徐 晖

责任校对:陈艳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李艳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1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01 - 018047 - 2

I . ①马… II . ①李… III . 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IV .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7345 号

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MAKESI ZHUYI WENMING LILUN JIQI DANGDAI JIAZHI

李艳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5

字数:392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8047 - 2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序一 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 在当代仍具有指导价值

刘书林^①

青年学者李艳艳最近完成了一本新著《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该书对于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产生、逻辑体系、实践路径、与西方文明观的比较及其当代价值都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发掘，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借着李艳艳的著作发表，笔者发表一些对于文明问题研究的一些思考，或许对于研究者有某些参考意义。

一、“文明”热炒的虚妄与科学研究的意义

“文明”这个概念本来在中国历史上有自己的相对明确的定义。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本来也有几个相对明确的概念。但是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文明一词都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引进外国学术思想的热潮和国内出现的文化热潮，文明这个概念就炒得越来越宽泛、越来越玄乎、越来越超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似乎成了一个可以超出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的特殊领域。一时间，什么都是文明或文化，什么问题都可以归因于文明或文化，文明或文化成了超出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级、最有价值的问题。一些时尚的人物也往往以“文化学者”自称，令仍然坚守科学的研究的人们瞠目不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并不是从中国自身的文化和文明脉络出发而形成的，而是借20世纪80年代一股狂热地照搬西方文化或文明说教的热潮而形成的。而且有的甚至以否定我国的民族文化和文明意蕴为出发点，提出：西方文明是以指向海洋、开辟殖民地为标志的“蓝色文明”，中华文明是以农业立脚的、黄土地为根基的“黄色文明”，这“黄色文明”已经没有任何出路，眼看就要玉石俱焚了，只有融入或变成“蓝色文明”才是唯一的出

^① 刘书林，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

路。其实,有些人是企图在回避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尤其是阶级分析的策略中,打开超阶级分析哲学和社会科学问题的歧路,获取自己的文化特权领地;也有的人更加简单地想在抽象的文化和文明研究中,重新演绎20世纪初照搬西方的故伎。

经过邓小平领导的反对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动乱、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多个回合的斗争,那种企图在文化和文明问题上打开缺口的“热潮”逐渐偃旗息鼓,人们的耳边也清净了许多。但是,近年来,有人又借着“国学”这个抽象而无法进行学科定义的领域,继续在文明和文化问题上做文章,刮起了一股来势很猛的以“国学”为旗帜的狂风。在这股狂风流行之处,许多身为共产党员或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干部都望风披靡,随波逐流,似懂非懂地重复着国学的调子,极不负责地追求着不该追求的时尚,以致“姓马”而不“信马”。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李艳艳能够拿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器,对着众说纷纭的文明和文化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分析和解剖,对文明问题进行了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以与国内外的文化热、文明热相抗衡和较量,其勇气和担当精神值得佩服,其成果具有重要的创新精神。

二、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对西方文明的评论趋势

西方通常所说的“文明”(civilization),在其流行中一般有这样几种含义:1.人类社会非常发展和组织化的一种状况。2.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3.作为整体考虑的全世界所有的人们及其生活其中的社会。4.提供现代社会舒适生活方式的地方。但是,自从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确立以来,特别是其扩张时期,资产阶级打着文明的旗号,赋予这个世界血与火的历史记录。西方在本国镇压和杀戮工人阶级的历史记录,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开辟殖民地的历史便是这样。但是,资产阶级在对自己的“文明”血腥历史熟视无睹的同时,却一直宣扬自己文明“美妙”的一面,掩饰其血腥的一面。这就太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直到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出现,才彻底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这是一个分水岭。此后,西方出现的研究文明的学者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大都带上了某种程度的批判性的分析,不敢笼统地加以吹捧了。反映这一特点的是现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斯宾格勒、汤因比。他们虽然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对资本主义文明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对于

后世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迪的意义。

现当代西方研究文明和文化问题的第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德国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斯宾格勒的文明和文化研究成果的代表作是《西方的没落》。这本书的第一卷于1918年出版,第二卷于1922年出版,其他相关的著作还有《普鲁士精神与社会主义》《人和技术》《决定的时刻》等。

斯宾格勒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文化的历史、文明的历史。而文化和文明是一个有机的,不断地从青春、生长、成熟到衰败,最终走向死亡的归宿。他认为世界上总共存在过八种文化或文明,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雅典、阿拉伯、墨西哥、西方文化。他认为前七种文化或文明已经死亡,只有西方文化存在至今,经历了从文化向文明的过渡。但他同时认为,西方文化如今也处于一种“无历史”“无生气”“僵死的”状态,并将于2200年以后瓦解。他认为西方文化的这一没落是历史的必然。

斯宾格勒采纳的哲学可以称作文化历史宿命论。他的文化宿命论的轮廓大致是:所有的文明,都要经历“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文明阶段”,周而复始,最终回到“原始状态”。他所说的“文明阶段”本身又可以分为:“战国时期”“帝国主义时期”。只有西方文化现在演进到了“文明的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的序幕是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0世纪就是真正的“文明的战国时期”。在这个时期,大国随意处理小国,世界大战不断,革命不断,一种文化区域内的各个国家也互相攻伐,最终合并到一个大的帝国的统治之下。世界一旦从“战国时期”进入“帝国时期”,对峙就结束了,大帝国出现了,强者战胜了,其他的都成为强者的战利品,这个时期的权力高度集中到个人手中,恺撒主义盛行。他认为,德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但未来成为主宰全球的世界大帝国的恺撒必然是德意志民族。

斯宾格勒文明学说的积极意义是承认了西方文明的没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他面对西方工业社会对人类的严重损害,特别是为了开辟世界市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全球性的大厮杀,以及不断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一定的意义上,他批判了西方文明中心论。

斯宾格勒文明学说的消极意义也是很明显的。1. 他把德意志文明当作后期帝国时期的主宰。这在客观上为战败的德国统治阶级重整旗鼓提供了新的精神支柱。一位后来成为纳粹分子的人说道:“虽然我们可能是没有希望的,然而我们却具有劫数已定的人们的希望。”^①2. 他虽然宣布了西方

^① 转引自林泰主编:《唯物史观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的没落，但毕竟也提出西方文明是在八种文明中唯一可以在 2000—2200 年期间成为最后的“帝国时期”的主宰。这仍然使得弥漫在悲观气氛之中的西方知识分子吃了一颗精神上的“大力丸”。3. 他宣扬的超阶级的、超政治经济制度的所谓“社会主义”，所谓“优秀劳工分子与旧的国家体制任务结合”，号召“为了征服别人而付出牺牲”，这与后来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基调几乎相同。4. 他的文明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非科学的。他认为，“对于人类来说，只要它在思考，想象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就是世界的本体。”^①

近现代西方研究文明和文化问题的影响更大的一位学者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汤因比的文明学说体现在他的著名历史著作《历史研究》之中，这本书先后共出版 12 卷，1934 年出版了第 1—3 卷，1954 年出版了第 4—10 卷，1961 年出版了第 11—12 卷。这部书自出版后风靡全球，影响不可低估。早在 1959 年，10 卷本的中译本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汤因比写作《历史研究》的动机是在读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之后产生的。开始他觉得，自己探索的问题“还没有在心中形成之前，是不是已经由斯宾格勒解决了”。但是他很快发现：“当我在斯宾格勒的书中寻找我们的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答案时，我发现自己仍有工作可做。……斯宾格勒的观点是最无启发性的教条主义的和决定论的观点。按照他的观点，文明的兴起、发展、没落与消灭是永远按照一成不变的时间表进行的，而对此却没有提出什么说明。”^②人们从这个角度不难看到汤因比与斯宾格勒的联系和区别。

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的“单位”是“社会(文明)”，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在他看来，社会是文明的别称。有史以来，人类有 26 种文明并存，每一种文明都经历过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四个阶段。任何一个社会都由“超人”和“大多数人”组成。超人负责制定模式，多数人的使命就是去模仿超人。超人是酵母，普通的大多数人是面团。超人退隐时，就去积累思想才华；超人复出，就是运用自己的思想去启动普通人，文明社会的脉搏就开始跳动。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就是这样的超人。文明社会的发展变化就取决于超人的退隐、复出及其与普通人的关系。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的情形是：1. 文明的最初的起点就是原始社会的超人

① [德]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林月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 页。

② 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7 页。

失去了创造力，大多数的普通人不再模仿他，整个社会就由原始社会的“静”（即“阴”）向“动”（即“阳”）的文明社会演进，其动力来自对环境挑战的应战。在一定的限度内，挑战越强，应战的成功率就越大。2. 文明的生长在于社会内部的自决能力的增强。如果在挑战面前应战过猛，超出限度，就会产生停滞的文明。超人退隐，经过反思，思想得到整理和提升，领悟到主要的精神原则，复出时就能够得到同胞的赞成和模仿，能够对挑战进行应战，就能够推动文明的生长。3. 文明的衰落在于自决能力的丧失、超人与大众的分离和对立。少数超人丧失了创造力和让别人模仿自己的行为影响大众的能力，只能靠权力和地位来左右多数人，大众就会撤销对超人的支持和模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开始对立，文明就开始衰落。4. 文明的解体表现为社会体与灵魂的分裂。或者多数人的模仿失败，或者超人失去创造的魅力，专靠武力维持国家。这时外部的、临近的蛮族的入侵，就会威胁解体中的文明。统治者与蛮族的这种互相制约作用就会分娩出新的文明。

汤因比是对中国了解较多的一位西方学者。1925—1929年，他到过中国的东北、华东地区，写成了《中国之行》一书。1967年，他还到过中国的台湾。他的理论体系中的阴阳、动静交替的节奏，就是来自老子、庄子和《周易》的思想。汤因比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断言中国文明处于僵化和解体的阶段，只有西方的文明将会把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未来世界的唯一政府，将由美国政府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但是，出人意料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他改变了对世界文明和中国文明的看法。他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指出：“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种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①同时，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他反对西方文明中心论更加彻底，他引用尼采的话语表达了：决不同意由那些皮肤上缺少色素的“黄毛畜生”被供奉在人类文明中心的宝座上。汤因比关

^①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展望21世纪——特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3—284页。

于世界文明发展未来的预言,与今日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的日益增大的作用,无疑是吻合的。

但是,随着 20 世纪末苏东国家发生剧变,社会主义低潮的出现,本来已经衰落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论,又有抬头的趋势,这种趋势虽然弱不禁风,没有多少生命力,但也不甘寂寞。其代表人物就是美国的文明研究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27—)。1993 年,他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文明的冲突》。这是他关于文明的主要代表作。

在《文明的冲突》里,亨廷顿认为:“文明是由语文、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共同界定。”“许多世纪以来,文明的差异一直是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冲突的导因。”^①亨廷顿断言:“全球主要的政治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②“文明间的断裂带目前正取代冷战中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边界,成为危机和流血的冲突地点。”^③“如果说还有一次世界大战的话,那将是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④“冲突的焦点在最近的将来会集中在西方与伊斯兰和儒教国家的关系上。”^⑤亨廷顿预测了将来的世界大战将在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之间进行。为了说明他的真实的意图,他在 1996 年 9 月跑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发表公开演说。他认为:“中国将崛起为新的强权。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复兴,中国人要求回复以往的历史地位,一雪前耻的意愿就越来越明显。”“美国和中国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如果美国不准备接受东亚单独由中国强权所主导。中国和美国之间就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文明战争。”^⑥

不难看出,亨廷顿制造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矛头对准中国,是为西方遏制中国发展服务的说教,为推行美国霸权主义张目。其实,亨廷顿的眼光确实是太“近视”,他没有能力洞悉或预测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底蕴与特点。他的这番说教制造的烟雾,在今天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面前,灰飞烟灭。

令人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出现的以斯宾格勒、汤因比为代表的这种批判西方文明的具有一些进步性的潮流并没有被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某些文化学者关注和尊重。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从外国搬来的文明这个概念,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正统的资产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载《外交》季刊 1993 年夏季号,第 22—23 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载《外交》季刊 1993 年夏季号,第 22 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载《外交》季刊 1993 年夏季号,第 24 页。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载《外交》季刊 1993 年夏季号,第 27 页。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载《外交》季刊 1993 年夏季号,第 49 页。

⑥ 转引自教育部社政司组编:《唯物史观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4 页。

阶级意识形态范畴之中的概念，顶多又加进了亨廷顿的指手画脚。他们的时代感还不如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西方文明的研究者，这是颇为奇特的现象，值得国人研究。

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某些文化或文明研究者，往往不是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局限和历史罪行，以昭明人类历史的进步，反而把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的资本主义文明，即西方的自我吹嘘和掩饰罪行的说教，直接搬到中国，企图来一次新的“全盘西化”。这与其说是什么“返祖现象”，还不如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些糊涂的文明研究及其留下的模糊乃至错误的概念和舆论，都应该加以清理。

三、马克思主义对待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研究文化问题的唯一科学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西方文明的时候，首先坚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恩格斯认为，所谓“文明时代”，就是由于社会在充分发展之后出现了奴隶制、中世纪农奴制和近代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所谓近现代的“文明”，就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恩格斯指出了这种文明的阶级性质时说：“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①李艳艳的著作之中，把马克思对于文明理论的逻辑起点锁定为“劳动”，以“劳动”为逻辑支点解析文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文明是消灭奴役劳动、实现自主劳动的历史进程。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任务是促使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相结合，消灭奴役性质的劳动，实现自主劳动。这样的分析就牢牢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根本。

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虚伪性和局限性。他指出：“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94 页。

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①马克思在谴责梯也尔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时说道：“这种为处置自己在战事结束后的杀戮中留下的成堆尸体而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光辉灿烂的文明啊！”“要想找到可以同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相比拟的东西，必须回到苏拉和罗马前后三头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发布公敌名单，不过这一次被列为公敌的是整个一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捕躲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不惜杀戮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机关枪来大规模地处决公敌，他们没有‘手持法律’，也没有口喊‘文明’罢了。”^②恩格斯还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越是凶残就越是伪善的规律：“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③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侵占殖民地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同时也认为殖民地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文明。马克思指出：“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④入侵印度的不列颠人，“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⑤因此，马克思深刻总结道：“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文明历史的这一番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19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0—85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61页。

析,比多少长篇大论更加清晰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本质和特点。此后,资产阶级就被剥夺了美化自己文明的机会,开始走资本主义文明的下坡路。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人从此能够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外古今的文化问题。毛泽东同志对待文化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所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等根本方针以及在文化和文明的继承问题上,强调重视那些人民性、科学性比较强的作品,强调那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借鉴作用和有益的作品,这些思想都是十分宝贵的。

经过新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努力,中国接近实现百年夙愿“中国梦”的前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正在展示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新姿态。汤因比现实预测的“中国主轴”正在展示其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这一点不容忽视,也不容歪曲,事实往往比人们的想象更快速地改变着世界对中国的观念。

中国的文化确实与美国不同,特别是中国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之后,就更不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能预料的发展规律了。中国的发展不是亨廷顿所预言的成为什么“强权”。中国现在的国民经济总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的地位,并在实践中扬弃了昔日采取的“韬光养晦”的状态,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2017年年初,中国代表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大加称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于洁评论说:“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中国显示出要在国际舞台承担更多责任的意愿,并试图发挥某种负责任的领导作用。在达沃斯就是这样展示的。”^①但是,中国高举的旗帜不是“霸权、主宰、战争、侵略”,而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是一个得人心的口号。甚至连已故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梦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消失,中国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这不是偶然的。这就是中国的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文化底蕴上产生的绚丽的文明之花。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所宣布的:“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②

^① 《美媒评中欧班列首抵伦敦:为贸易市场提供新机遇》,参考消息网2017年2月4日,见<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70204/1646410.shtml>。

^② 《习近平: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新华网2014年3月28日,见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3/28/c_119984544.htm。

李艳艳的研究之所以及时,之所以宝贵,就是因为她在中国的新文明在全世界展示影响的时候,对文明给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谨以以上议论赞扬李艳艳专著的发表。

2017年6月12日完稿于寓所

序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指南

罗文东^①

自从人类告别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追求文明进步就成为世界人民不懈奋斗的总体目标和强大动力。然而,受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和旧式分工、等级秩序、阶级对立、民族矛盾、国际冲突等影响,人类在取得不同程度的文明进步的同时,也遭受着各式各样的苦难折磨。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所说:“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可以说是文明时代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所遵循的规律”^②。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长达 5000 年。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始终走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所创造的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到 15 世纪以后,西方主要国家先后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逐步崛起,并向世界扩张。从此以后,古老的神州大地在新旧思潮和中西文明的交流和冲撞下,开始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嬗变;中国人民也主动或被动地投入痛苦而漫长的现代化浪潮。尤其是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落后挨打、四分五裂、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深刻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

^① 罗文东(1967—),男,四川省射洪县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中国社会科学网总编辑、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和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04 页。

国”^①。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在鸦片战争以后那个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先后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引和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一次次抗争都失败了。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文明的致命缺陷。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民“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②

1921年7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③从此以后，中国人民有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和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社会有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中华民族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96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时代特征和人民意志结合起来，完成和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这三件大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道路，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历史和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为人类解放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李艳艳从2010年9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以后，逐步确定以中西方文明发展的理论和道路问题为主攻方向，陆续撰写和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结构论》等一系列学术论文。2013年5月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研究》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答辩委员的一致肯定和好评。2015年12月，她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获准立项。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和探讨，该项目的最终成果就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了。我作为博士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生导师,感到由衷的喜悦,并欣然为之作序。

李艳艳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可以说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分析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科学内涵、发展历程、逻辑体系、实践路径和指导作用等重大问题的专著,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作者提出: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既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竞争,更是文明进步模式的较量;文明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综合性概念和基本范畴,文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全面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不仅对我们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对我们积极争取界定文明标准的国际话语权、探求当代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实现路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文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问题上,作者从劳动与文明的关系出发,揭示文明是劳动阶级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矛盾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在物质发展、制度完善和文化进步等方面所形成的积极成果;如果说广义上的文化表征着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的话,那么文明无疑彰显了文化的正价值取向。在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伟大变革作用问题上,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作为人类先进文明理论的思想结晶,在文明进步源泉的定位方面实现了从抽象理性到劳动实践的转变,在文明进步方式的理解方面实现了从理性自觉到阶级斗争与交流互鉴的转变,在文明基本特征的阐述方面实现了从一维性到多样性的转变,由此为我们解读文明发展规律提供了最为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逻辑体系和实践路径问题上,该书提出: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把文明的历史与进步规律作为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把基本问题准确定位于文明的进步路径之上,并且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着重揭示了文明本质论、动力论和评价标准论所具有的理论基石意义,阐述了践行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依靠力量和实施系统,形成了对于文明发展的本质规律的创新观点和见解,以彰显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持续至今的巨大生命力和感召力。在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当代价值问题上,作者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目标、动力、主体和领导力量,并且成为我们回应当代西方文明理论扩张的有力话语。该书主题明确、思路清晰、结构完整、论证翔实、观点鲜明,可以说是一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力作。因此,特向关心人类文明进步的有识之士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者推荐这本书。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